

# 廣州·重慶·成都·臺北

胡治章

## ——追隨鄭彥棻先生的一段回憶

民國三十八年八月在廣州，我進入執政黨中央黨部追隨鄭彥棻先生服務，當時鄭先生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我不認識他，也不是中山大學的學生，我是陸軍官校十九期工兵科畢業的，與他毫無淵源。那時正是兵荒馬亂，局勢非常緊張，鄭先生身負重責，必須奔走各地。因此，他需要一位忠誠可靠、機警、年輕、未婚，能動筆也能用槍，更更能刻苦耐勞，隨他行動的人，最好是軍校或警校畢業的。當時隨他工作多年的何樹祥、袁國維、何啓昌三位先生及家兄肇樺等私下商量，結果認為我尚能適合上述條件，於是就商於我。我當時已由軍校同期工兵第二隊同學溫進祺君（溫同學廣東海南島人，廣州陷後在珠江口萬山羣島力戰被俘，被共軍以種葱式活埋於廣東中山，香港工商日報曾有刊載。）介紹給廣州衛戍總司令部參謀長李崇詩將軍，即派任為上尉參謀。在進退取舍之間，家兄肇樺却曉諭再三，認為論工作需要，應該追隨鄭先生，於是國維兄偕往謁見鄭秘書長於廣州南堤中央黨部，我遞上簡歷之後，鄭先生就問：「簡歷是不是你寫的？」

「我說：「是的。」他說：「你寫的字不錯呀！」

，跟着又說：「中央隨時會遷移，我去什麼地方，你能否同去？能否吃苦耐勞？」我說：「絕無問題。」他又問：「你會用槍？」我說：「我是軍人，當然會用，而且自備一支左輪手槍。」鄭先生即點頭說：「很好，明天就來報到上班。」立即下條子派我職務，爽快得很。

次日早上七時許，由國維兄和我赴廣州東山東平路鄭先生寓所，鄭先生即介紹我認識他的夫人綸蘊珊女士，她非常慈祥，可敬可親，絕無半點官太太的架子。鄭先生伉儷有四女二男，按次為雪玫、雪馨、雪菲、雪茵、至豪、至傑（後改名至剛）。雪玫那時才十四、五歲，至傑才四歲，鄭夫人稱我為胡先生，小孩們都稱我為胡哥哥，卅多年來一直如此。鄭先生吩咐我對他的孩子們直叫名字。這對我這個出道未久，從未接觸過軍政首長的青年人來說，印象是新鮮的。

### 用人不疑 生命交給我

初進中央黨部一切覺得陌生，每日隨鄭先生進出，他開會時間甚多，我則奉命拆閱信件，摘要，適時呈閱，紀錄約會。當時中央黨部有一部

份同志已分別遷往臺北和重慶，鄭先生則率領這一份份同志在廣州辦公。後來局勢日緊，第二批又疏散去重慶，連司機劉承林同志也要跟他們走。鄭先生當時就急於要我一位可靠的司機駕車。在座的袁國維兄隨即稱：「『南堤的士公司』的司機很熟，技術不錯，道路熟悉，不成問題，可即雇用。」鄭先生面色一沉答道：「你都不明白我的意思。」我立即警覺到局勢緊張混亂，共諜到處滲透，所謂司機「可靠」問題，當係指政治性的。我當時即說：「我有一支手槍，五十多發子彈，隨時帶在身上，整天陪同你進出，如果司機有何異動，當即給他一槍。」鄭先生粗眉一揚說：「對啦，治章還算警覺，軍校出身，果然不同。」鄭先生隨即以極其沉重的口吻囑咐說：「治章，你要特別留意，必要時要打我一槍。」這句話把我嚇呆了，當即請他明示，他柔聲說：「你知目前很混亂，倘若陷入匪手，非此不能保一世清白，道理在此，大義在此。」他說時沒有激昂的表示，但目光淩厲，面色凝重，這個印象，卅多年後的今天，仍然清楚地現在我的腦際。可見他早已準備以身殉黨，効命領袖。疾風勁草，使我

份同志已分別遷往臺北和重慶，鄭先生則率領這一份份同志在廣州辦公。後來局勢日緊，第二批又疏散去重慶，連司機劉承林同志也要跟他們走。鄭先生當時就急於要我一位可靠的司機駕車。在座的袁國維兄隨即稱：「『南堤的士公司』的司機很熟，技術不錯，道路熟悉，不成問題，可即雇用。」鄭先生面色一沉答道：「你都不明白我的意思。」我立即警覺到局勢緊張混亂，共諜到處滲透，所謂司機「可靠」問題，當係指政治性的。我當時即說：「我有一支手槍，五十多發子彈，隨時帶在身上，整天陪同你進出，如果司機有何異動，當即給他一槍。」鄭先生粗眉一揚說：「對啦，治章還算警覺，軍校出身，果然不同。」鄭先生隨即以極其沉重的口吻囑咐說：「治章，你要特別留意，必要時要打我一槍。」這句話把我嚇呆了，當即請他明示，他柔聲說：「你知目前很混亂，倘若陷入匪手，非此不能保一世清白，道理在此，大義在此。」他說時沒有激昂的表示，但目光淩厲，面色凝重，這個印象，卅多年後的今天，仍然清楚地現在我的腦際。可見他早已準備以身殉黨，効命領袖。疾風勁草，使我

深為感動和激動，但也更覺我的責任無比沉重，所以我常常深夜在想，在何種情況下才能扣動槍機，不致抱憾終身。這與當年谷正綱先生在一次中央非常委員會會議中大聲疾呼：「寧做史可法，不作洪承疇！」相互輝映，令人由衷敬佩。

## 廣州撤退 最後才走

十月十一日，鄭先生吩咐我搬到東山他家裏住，因為局勢很緊，隨時準備撤退，到達時，看見鄭夫人正在收拾行李，前去臺灣。當日鄭先生以電話與廣州空軍基地司令吳順明上校聯絡，詢明天日有運輸機去臺北，允予鄭夫人及孩子們七個機位。十二日上午，鄭先生命我赴機場面晤吳司令，問明飛機何時起飛，何時應到達機場，可帶多少行李。吳司令告訴我，中午起飛，但飛機將降落新竹機場，而非臺北，問我鄭夫人及小孩們是否搭乘。我說一定搭乘，因恐說不搭，萬一沒有其他飛機，有誤大事，於是代為決定。這可能是在步兵操典總綱上學到的「當機立斷」。由機場立即回到鄭公館，面報接洽情形。鄭先生大為火光說：「我和吳司令講好是搭去臺北的飛機，你為何改搭去新竹的。」這時我年輕氣盛，立即抗辯說：「我那有權決定飛機飛那裏，因為吳司令說今天飛機不飛臺北，改飛新竹，所以我決定去新竹的也搭。」於是鄭先生和家人，國維兄和我分乘兩輛車，一是秘書長的座車，一是臨時借來的吉普車，逕赴飛機場。吳司令即告以本日五架運輸機都改飛新竹，鄭先生即說，既然各機都不飛臺北，就先到新竹再說吧。在候機時間

，立即以長途電話通知臺北有關方面，予以照料。因為鄭夫人帶着六個小孩，人生地疏，在那緊急時期別無選擇，難怪鄭先生內心焦急牽掛的。飛機起飛後，鄭先生和我們同車回市區，先到南堤中央黨部巡視，然後回東山寓所，這時市面漸有緊張氣氛。國維兄當日下午赴港。當晚由何啟昌兄和我陪同鄭先生住在寓所，鄭先生說，行李要收拾好，隨時撤退。十三日凌晨四時許，接到行政院副院長朱家驊先生秘書的電話說，現即派車來取行李，稍後請鄭秘書長及隨員赴天河機場（係軍用機場）。早餐後我們三人即往機場，一直候至中午，才搭乘朱副院長的中央航空公司專機飛重慶，同機的共有二十餘人。啟昌兄因打算在廣州多停留一兩天，然後去香港，未同行，事後才知道，當他由機場回到市區不久，廣州即大起騷亂，可能是潛伏的匪諜或四鄉土匪作亂，他一看情形不對，立即奔赴長堤，擠上一艘拖船站在船邊，一直站到澳門，身上只有一件白襯衫一條白西裝褲，到澳門才買牙刷手巾，隨即轉赴香港，狼狽不堪，但亦見他於患難中不失忠貞。

到重慶後，鄭先生和我初住進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招待所，後來遷入中央黨部招待所「特園」。我則與招待所主任張伯華兄同房。當時政府西遷，總裁早已抵達重慶聯絡各方策劃保衛西南各省，鄭先生襄助領袖，安排中央執委會會議，極為繁忙。那時李宗仁留在桂林，中央迭次請他來渝共商大計，詎料他竟藉口治病，溜往香港，後來鄭先生又奉 總裁之命與居正、朱家驊、洪蘭友諸先生由渝專程飛港，勸請李宗仁來渝未果，原

來這位「代總統」心懷不軌，稍後竟溜到美國作叛國勾當去了。

中央政府原計劃撤往西康，這消息是居正院長的一位秘書私下告訴我的，那時，李文範、馬超俊兩委員由臺北來重慶開會，住在特園招待所。他們也對我談及此事，知我必隨鄭先生前赴西昌，便說西昌天氣非常冷，你現有的衣服無法禦寒。他們因為會後即返臺北，那邊天氣不冷，有些衣服用不着，隨即叫我到他們的房間，李委員贈我絲棉襖一件，馬委員贈我厚羊毛衫一件。黨國元老愛護後輩的慈懷，令人永銘難忘。

## 渝蓉道上 車子壞了

三十八年十一月底一天下午，鄭先生命我陪他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秘書長狄膺先生赴白市驛機場，鄭先生說：「因為機位不夠（當時兩航已投匪，僅靠空軍運輸機和C A T少數貨機），只有中央執監委才有機位，待我和狄秘書長登機後，你乘我的車赴成都吧。」因為公路撤退車輛甚多，由重慶市區到達白市驛機場時，已下午六時許，天色已黑，當晚飛機未到，我們（立法院副院長長健羣也在）呆坐到天亮，粒米、滴水未進。上午六時許運輸機來了，登機時，鄭先生對我說：「現有一個多餘機位，你就隨我上機吧。」我說：「我的行李仍在特園未收拾，要回去料理。」他稍加考慮說：「現在局勢很緊，你要小心，還有去成都車子汽油不夠，我寫一張名片介紹你去林園官邸見侍衛長（不記得是否劉牧羣將軍）給你汽油，以便行車。」可見鄭先生臨危不亂的

細心遇到與關懷，如非這張名片特別介紹，路上找不到地方加油，命運將不知如何？飛機起飛後，我立即乘車回重慶市區，去到「特園」，只有廚師老黃在；他說中央黨部全體同志昨晚都走了，你的行李是張伯華主任代為收拾帶走的。於是我和司機劉承林同志去中央黨部一看，果然都走了。我們開車到附近麵館吃麵充飢，兩碗麵剛好端上，南岸迫擊砲機槍聲大作，我立即付帳，麵也不吃，馬上開車而去。中午趕到林園，出示鄭先生的名片，經三重警衛，見到了侍衛長，再道明來意，他立即吩咐給我們車子加滿汽油，並送來開水，另贈餅干一大包，並說：「這些餅干是昨晚隨總裁巡視重慶市區時順便買的，給你們充飢吧。」隨即又說：「根據情況，你們必須在今晚八時前通過璧山。」我道謝後，立即啟程，沿途西行車輛甚多，我們儘量超車。在各地站頭，仍有地方慈善團體設站施粥，我和劉承林也喝了幾大碗，受惠良多，更深感我國同胞優良傳統，慈善為懷之可敬可愛。車行至晚上九時，忽然出了毛病，檢查結果，發覺水箱漏水，機器太熱，於是跑到附近民家買了一個大茶壺，將水箱加滿，機器稍冷，繼續前行，沿途每十幾公里即要停車加水一次，如此停停走走，至凌晨四時，在一市鎮路旁，看見中央黨部大隊的車輛，於是立即停車，找到各位同志，心裏才稍覺安定，原來他們也是半夜停宿的。記得那時秦孝儀、夏正祺、張伯華、劉漢浚諸兄和其他同事見到都說，我們都在關心你呢！同志愛充分流露，甚是感人。上午六時全體繼續出發，不久再停下來，原來已

近內江渡口，只有一艘駁船載車輛渡河，幸而河幅不寬。我下車步行至渡口觀察，並點數在我們前面等候渡河的大小車輛，共有八百餘輛。我們的車隊一直候至次日凌晨始渡渡河。在等候期間，中央黨部的司機們合力把我們的汽車設法修理好，大隊順利開向成都，當晚抵達，全體入往四川省黨部。好在省黨部地方甚大，全部連家眷警衛均可容納有餘。

當天晚上，鄭先生即到四川省黨部探望各位同志及眷屬，親切慰問，並囑好好休息，那時他和其他中央首長住在勵志社，每日都奉總裁之命到中央軍校開會，但總抽出時間到省黨部察看同志和眷屬。

## 成都突圍 全靠空運

當時的局勢，可說是惡劣到極點，西南的軍閥如劉文輝、鄧錫侯、盧漢、羅廣文等已被共匪統戰搞得頭昏眼花，叛跡已露，幸賴總裁坐鎮成都，尚可鎮懾羣魔。但撤退西昌的決定，迫於環境，不能不改變，全部撤到臺灣。可是那時陸路不通，一切全靠空運。據所知只有八架空軍運輸機可供成都撤退之用，而留蓉的中央政府各機關人員則達數千人，連家眷算起來更不止此數。運輸機只是C46、C47型，載量有限，速度又慢，絕非現代的747或DC10可比。而可供撤退的時間又非常緊迫。聞說當時中央決定，先撤退各級職員，家眷暫不撤退，這消息一傳出，中央黨部有家屬的同志大譁，紛紛說，要走大家走，要嘛大家不走。這種心情是可以體會的，但却非解決問題

的方法。鄭先生既不能秉承中央決定表示強制執行，又無法說全體眷屬可以同時撤退。面對這許多同事們的眷屬，他內心是如何沉重與難過！後來幾經解釋、說服，並由中央按每口發給相當數額銀元路費，以便個別逃離大陸，問題方始解決。在蓉中央黨部工作同志均撤至海南島，然後轉飛臺灣，不久我們在臺北又再重逢，共同工作。

大約是十二月五日凌晨，鄭先生突然派車來接我一同赴鳳凰山機場，說是奉命候機赴港轉臺，到機場後不久，他又回去中央軍校，我和國民大會一批人在機場等候整天，至晚十時，鄭先生和洪蘭友先生始到機場，候至深夜十二時許，一架C47的貨機降落，次晨五時許抵達九龍啟德機場。鄭先生住進香港銅鑼灣新寧招待所，囑我不要告訴任何人，僅通知了樹祥、國維、啟昌諸兄及家兄肇權前往協助。鄭先生在港僅停留一天，即飛臺北。我則拿了他的介紹名片往謁在滙豐銀行三樓的交通部長端木傑先生洽領機票，安排機位於十二月十三日乘「香港航空公司」飛機抵達臺北。

## 耳提面命 受益良多

在臺北隨鄭先生服務的五年期間，中經中央黨部秘書處，改造後的中央第三組及僑務委員會，我負責他的信件拆閱擇要呈核分辦，保管機要文件，訪客接待，約會安排，每日工作常在十四小時以上，與鄭先生接近機會極多。床頭且有一具電話分機，隨時和他聯絡。他對屬員工作要

求一向很嚴，對我更嚴。我住在中央黨部內右側的木造單身宿舍，除了工作就在宿舍，絕少有私生活，但仍常受到嚴厲教訓，好在我是軍人出身的要求。跟鄭先生做事，雖然有苦頭吃，但也學到好處。記得剛到臺北不久，鄭先生尚係立法委員，他在立法院的薪水和出席費都是我代領的，私章也由我代管，那時立委撤到臺灣的，大多沒有居所，政府經由立法院發給每位立委新臺幣三千元，作為房屋津貼費，以解決住的問題。鄭先生特別吩咐我說：「總裁已指定浦城街一幢丙種住所給我住了，我雖是立委，但有了房子住，就不應該再領房屋津貼費。」我當然遵示沒有為他代領。當時三千元新臺幣是個大數目，鄭先生這種態度，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啓示，就是雖然是權利，但在「應該」與「不應該」之間是有很大的分際的。

我工作上偶有錯誤或未做妥，必遭鄭先生嚴斥，遇此情形，同事們美其名曰「恭維一番」。我當時年少氣盛，常據理力爭或解釋，有一次，鄭先生對我說：「上級交付的任務，如未準時達成，總是不對，我的指責是一種教育。須知『信』字是整個的，如十件事情，只做好七件，三件做不好，你整個『信』字就沒有了。別人不會對你保留百分之七十的『信』的。」

### 生活簡樸 關懷部屬

鄭先生對部下雖嚴，却很關懷他們的康樂和生活，那時國家經濟困難，待遇微薄，物質生活

十分貧乏，政府及黨中央為照顧各級公教人員和黨工幹部的保健，曾舉行一次全面性的肺部X光透視，三組陳錦昌兄發現有肺結核，他家累很重，精神所受打擊更大，鄭先生知道後，立刻吩咐辦總務的徐壽春兄給他一筆錢並給他公假休養，以迄康復。逢年過節，鄭先生必與各位副首長及有家眷的高級職員商量，大家分別邀請所有單身在臺同事到家中共同歡渡，享受家庭溫暖。我在臺北一直未婚，經常在被請之列。總裁在年節頒給鄭先生的禮金，他也分別轉贈予平素工作特別努力或家庭負擔重的同志，藉表獎勵及體恤之意，我是常常有份的。他本身及家庭生活却甚簡樸，那時臺灣電冰箱很貴，他雖身為中央首長之一，也未具備，不似現在全民皆有。臺灣多數時間天氣炎熱，沒有電冰箱實在不便，後來他家中買了一個外面木製內裝鐵皮的冰箱，每日購冰塊放在裏面，以保存食物。直到鄭先生的摯友何世禮將軍奉派赴日本擔任軍事代表團長，將自用的電冰箱送給鄭先生，他家裡才有電冰箱使用。

### 服務代領導 榮譽歸僑胞

大家都知道鄭先生任第三組主任兼僑務委員長時的成就，發表了「無僑教即無僑務」的警句，却很少人知道鄭先生對派往海外工作的同志有「服務代替領導，榮譽歸於僑胞」的訓示。我自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八日到達中美洲瓜地馬拉後，即深深體會到這一訓示的重要性與實際性。那時我的工作經費和生活費都是當地自籌。如果不能加強服務，讓僑胞們享有應得的榮譽，又怎能取得他們的信任與合作，爭取他們對祖國的向心呢？我就遵行這一訓示，到達瓜國後，未接受中央分文支持，完全在義務式的犧牲奉獻下，整整工作了十五年。現在我仍在海外，算起來離開鄭先生已經二十八年了。我追隨鄭先生工作於國家最危難之時，他做事的認真負責對我影響深遠，他對黨國對領袖的堅貞，我親見親聞。他的「念舊」美德，我深感難忘。我不善於寫文章，尤非「歌德派」人馬，我只是將浮現在腦際一幕幕的事實紀錄下來而已。

## 中外文庫 寸草悲

徐櫻女士著

定價臺幣捌拾元

本書係旅美名女作家徐櫻女士精心傑作，思親、懷舊、憶往，至情至文，感人至深，附珍貴圖照多幀及徐小虎博士英文名著回憶奶奶，內容精彩，篇篇可讀。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